

语言选择与语言教育历史与地域的观察

周清海 南洋理工大学

一、历史的考察

中国自古就是个口头语言严重分歧（多方言）而书面语却高度统一的社会。从先秦时期留下来的典籍资料看，书面语言是相当一致的（文字的字形尽管有差别，但语法与词汇差距不大）。分歧的各种口头语言，以及有差异的文化之间，关系是不平等的，甚至是相互对立的。《论语·宪问43》里说：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孙弟，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以杖叩其胫。

原壤是孔子的老朋友。孔子臭骂老朋友，并且气得“以杖叩其胫”，跟原壤的“夷俟”有密切的关系。当时中原人的坐势和夷人是完全不同的，这在甲骨文里看得很清楚：中原人的坐势是“踞”（相当于今天日本人的坐势），夷人的坐势却是“蹲”。甲骨文里与日常起居有关的字，如“令、既、即、祝”等字，其坐势都是如此，与夷人的坐势全然不同。原壤用夷人的坐势等孔子，这对于主张“攻乎异端，斯害也已。”（《论语·为政16》）的孔老夫子，是绝对不能容忍的。难怪对老朋友用夷人的坐势等着他，他会气得又骂又打。夷夏，在孔子那个时代是俨然有别的。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左传·成公四年》）都是这种歧视心理的反映。

孟子也轻视外来的语言和文化，《孟子·滕文公上4》有下面的一段话：

今也南蛮鴟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师而学之，亦异于曾子矣。吾闻出于幽谷迁于

乔木者，未闻下乔木而入于幽谷者。《鲁颂》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学，亦为不善变矣。

“为神农之言”的许行，孟子用“鴟舌”来比喻他说话，认为许行所说的是“非先王之道”，又说“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同上）更说“周公方且膺之”。对于异己，除了见解不同之外，更重要的是这些见解是来自不同的族类，所以持断然否定的态度。可见先秦时对南方的语言文化是非常轻视的，乃至政治上也是相互对立的。

语言的分歧，在教育上，就必须有所选择，孔子的选择是“雅言”（也就是当时的标准语），《论语·述而18》说：

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

根据书面上的记载，中国最早从政治层面，通过行政方式，强制推行语言计划的，恐怕是秦始皇了。秦始皇以秦本土的文字为基础，统一了中国的文字。依照《说文解字·叙》的说法，当时的情况是：

……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

但其他六国的子民，却有人冒着生命的危险，将六国文字写的书偷偷地藏起来。可见六国的子民对自己文字的感情是多么的强烈。楚国诗人屈原以楚声入诗，也是反映了他对自己语言的坚持。

秦始皇的语言规划，推行时，对其他六国的子民来说，适应起来是痛苦的，但从今天看来，这个语言规划对中国的统一，中华民族的统一，起到的作用却是巨大的。

我们引用上面的例子，是要说明在多种语言的环境里，语言的选择，是自古以来就必须面对的。教育上对语言的选择，也是免不了的。而且选择以后的执行，从来就是痛苦的。

语言学习，也应当注意语言应用的环境，《孟子·滕文公下6》有这样的记载：

孟子谓戴不胜曰：“……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齐语也，则使齐人傅诸？使楚人傅诸？”

”曰：“使齐人傅之。”曰：“一齐人傅之，众楚人咻之，虽日挞而求其齐也，不可得矣；

引而置之庄岳之间数年，虽日挞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

这一段记录，涉及语言教师的资格：教“齐语”的教师，必须是会说“齐语”的，当然，就以“齐人”为最佳选择。学习者的环境，必须是有助于鼓励学习的，绝对不能是“一齐人傅之，众楚人咻之”的。如果能充分浸濡：“引而置之庄岳之间数年”，那就是最好的。

从先秦到近代，中国仍然保持着“口头语言严重分歧（多方言）而书面语却高度统一”

的局面。“五四”以来的白话文学运动，只是将书面语从“文言”改为“白话文”。当时，虽然也提倡“国语”，但以“普通话”为标准语，有计划、有步骤地加以推广，却是1949年以后的事。参与推广“普通话”为标准语的人士，在“方言”与“普通话”的关系上，前后的态度也不一样。王力就曾说：

我个人有八个字的口号，就是“提倡国语，拥护方言”。所谓国语，它本身也是一种方言；它并不比其他的方言更优美，更完善，或更能表达意思。¹⁾

但是，语言的统一与规划，是任何国家都必须面对的。方言与标准语之间的关系，不是多个语言之间平等的关系，而是上下位的关系，是“低级形式的方言必须服从高级形式的共同语”²⁾。这是现在大家的共识。不在这个共识下处理标准语和方言的关系，就会出现语言的不和谐。我们以上海为例子：

上海……在语言使用方面，已形成了以普通话为主体的多种语言和方言并存的格局。……

学生在家庭中使用上海话的比例是随年龄的增加逐渐上升的，且上升的幅度较大，……小学五年级学生使用上海话的比例约37%，而大学生使用上海话的比例超过70%。……有超过半数以上的学生对待上海话的态度是肯定的、积极的。³⁾

这份调查报告同时建议：

学校在确立普通话主体地位的同时，可以结合进行乡土文化教育，在中小学开设拓展型课

程，向学生传授一定的上海方言知识，但不必给学生增加额外的方言学习负担，不给社会

1)王了一《漫谈方言文学》，见《观察》第5卷第11期，1948年11月6日

2)濮之珍《民族共同语与方言的关系》，见《语文知识》1956年总第47期

3)“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课题组编《2006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商务印书馆，2007）页198-210

增加额外的教育成本。

仍然强调“确立普通话主体地位”，而进行乡土文化教育时，要做到“不必给学生增加额外的方言学习负担，不给社会增加额外的教育成本”。在“以普通话为主体的多种语言和方言并存的格局”，就已经表现了标准语和方言的上下位关系。

语言是最能动人感情的，但是处理语言问题时却是需要更多的理智，最不能动感情的。语言的选择与语言政策的决定，考虑的不纯粹是语言因素而已。语言的选择与语言政策的决定，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考虑远远超过语言上的考虑。⁴⁾在全球化的环境下，更是如此。

在全球化的环境下，外语的选择与学习，更提到教育的范围内来考虑。方言、共同语和外语，如何选择取舍，是今天语言规划者、语文教育工作者、家长、政治领袖必须谨慎面对的。《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06）》说：

在尊重汉语方言的同时加大推广普通话的力度，……在尊重母语的前提下加强外语学习……

营造“多语多言”的和谐语言生活。

我认为，这是正确的看法。这个看法，要怎样在不增加社会成本和教育成本的前提下，落实到语言生活和语言教育里？能同时精通双语的，只有少数人，大多数人都只能精通一种语言。怎样平衡方言、标准语和外语的学习，以达到和谐的语言生活，是我们应该慎重考虑的。

二、地域的考察

4)周清海多语环境里语言规划所思考的重点与面对的难题——兼论新港的双语优，见《普通话教育发展和推广国际研讨会（2002）论文集》（香港大学教育学院普通话培训测试中心编，2003

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和语言环境，也就有不同的处理语言问题的做法。这里，我们以新加坡和马来西亚，香港和台湾作为讨论的重点。

一个国家的语文政策或者语文教育，都是以该国家的利益为考量的重点；由多民族组成的国家，各民族的利益，无论是语言利益、文化利益，都得服从于国家利益。所以，语言或语言教育，不只是属于“人”（不同民族）的问题，更是属于“地”（国家）的问题。如何处理好“人”和“地”的关系，是目前东南亚区华人语文教育所面对的两难问题。

语言的学习都是有功利目的的。你把这个功利目的摆在“人”上，还是摆在“地”上，就出现不同的政策和不同的做法。

新加坡更注重“地”的因素。为了国家的发展，民族和语言的和谐，新加坡以英语为行政语言，在教育上，英语同时也是教学媒介语，母语（华语）只是学生的必修科目。我们认为：

学好英文，是新加坡发展和国际化的关键因素；至于母语，只要保留在适当的程度上，在需要出现时，我们能够在这个基础上往前发展。⁵⁾

至于方言，新加坡有10几种之多，而以说闽南话的人口比较多些，但也不是主流。19世纪，方言就已经从教育景场中退出来了。我们比香港幸运些，我们不是单一的方言，不必面对和处理方言的教育角色问题。我们将方言留在家庭里，让家长去决定它的位置和传承。

语言具有维系情感、传承文化的价值。方言当然也具有这些价值，这是毋庸置疑的。语言也具有商业和其他实用的功能，方言当然也不例外。照顾方言的这些功能，是家

5)周清海《新加坡的语言教育和语言计划》，见《华文教学应走的路》（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1998）页3-14，又见《中国语文》1996. 2. 页125-130。

庭、宗乡会馆的责任，而不是政府或教育单位的责任。

为了让学生更好地学好母语（华语），我们更限制方言在娱乐和传媒里的应用，同时推行讲华语运动，使华语成为学生的生活语言。在有华语口语作为生活语言的基础上学习华文，也就容易多了。我们更从语文政策的高度，强调与维持华语共同的语言核心，向普通话倾斜，在语文教学和大众传媒方面，特别注重这个核心，使我们的华语走得出去。我们同时也提倡交流，互相吸收，提倡建立“大华语”的概念。这些做法，对新加坡这个只有人力资源的小国，是必要的；对于汉语的发展，汉语走向世界，我想也是必须这样做的。

我们是认真地选择语言，执行我们的语言政策的。但是，我们仍旧有些隐忧。

我在1990年说了下面的话：

我们年轻的一代，因为华语词汇量的不足，在应用华语时，力不从心……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双语人士，在大多数场合里选用英语……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做到让华人对华语和它所代表的文化具有认同感，觉得学华语讲华语是天公地道的事，觉得掌握双语是光荣的，那么，年轻人出现语言认同感转移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过去受华文教育对方言的认同感转移到华语上面来，他们不觉得放弃方言是可惜的。如果我们的年轻一代对语言的认同感转移了，他们也会觉得放弃华语是不可惜的。⁶⁾

文化与语文程度两方面，我们更重视文化，因为三十几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能同时精通双语的，只有少数人，大多数人都只能精通一种语言。因此，我们将华文列为必修课程，将华文保持在适合学生能力的水准上。但是，语文程度和文化、语言的认同，是密切相关的。母语能力过度低落，就会助长对英语的语言认同，文化认同。如果我们年轻的一代，认为英语是自己的母语，那么，我们的双语教育就可能失败。

6)1990年4月29日在新加坡海南会馆举办的双语教育面面观座谈会上发言稿

从2000年到2005年，这5年间，在家中使用英语的华族家庭，从24%升高到29%，英语成为更多新加坡华族的家庭用语。同事吴英成先生把这种现象称为“脱华入英”，并且积极提倡对这些学生采用以英语为媒介语来教授中文。

我以为，不管怎样的变化，在可见的将来，新加坡的华语，还是不能被认为是家庭用语为英语的华人的“外语”，它毕竟和中国人学习日语、德语、法语不同。在全球化环境下，中国的崛起，可能进一步改变新加坡华语的生态。过分强调华语成为少数华人的“外语”趋势，对新加坡的华文教学，可能带来不利的影响。这是必须谨慎处理的。

其实，新加坡说华语的人群也在不断的扩大，尤其在华语走向世界的大局面下，这种扩大的趋势，预料将更趋明显。李资政的观察是：

新加坡社会说英语的社群正在扩大，而说华语的社群也在扩大，虽然他们的华语水平一般。在媒体行业里能够以高层次华语进行沟通的人数逐渐减少。这也是难以避免的，因为在大学和理工学院只有少数人学习华文。在工作场所，除了华文媒体外，人们都只使用英文。⁷⁾

在中国发展的大局面下，我们正面对提高华文程度的问题。这个问题，不是新加坡全民性的问题，而是少数和华文工作有关的人员、与中国交往的人员的问题。我们每年只要能培养一千个左右具有高水准的华文人才，就能满足这个需求。至于全社会，我们所致力的是保留普及性的华文基础。我曾说：

我们有了普及的华语语言社会基础，……不只保证了华语华文在新加坡的生存，而且也提供了将来往前发展的条件。高级华语人才的培育，也需要这个基础的支持。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普及的语言社会基础，要培育高级华语人才，将会面对更大的困难。

新加坡人说华语的流利度，更是一项可贵的社会资产。如果和香港相比，在听说华语方面，新加坡的优势就非常明显了。当然，新加坡华人一般的华语读写能力落后于其他

7)李光耀内阁资政致周清海教授从教40年晚宴贺词

华语区，也是不容否认的事实。这就是关心华语语文教学的新加坡人所以感叹华语程度低落的原因。但是我们认为，在应用需求出现时，华语程度是可以逐步提升的。我们相信，语文程度的提升和应用的需要有着密切的关系。⁸⁾

新加坡奉行的是不变的语文政策——双语政策，而语文程度却是可变的、可调整的。语文政策的推行，充分照顾了局部与全面：根据个别的需要、不同的能力，允许不同程度的发展；而对全民，则有最低的语文要求。新加坡新一代，在中西方都能生存，而又没有失去竞争的能力，没有失去华人的特点，这就说明了我们的语文教育政策是比较可行的。

马来西亚的华人特别注重语言的“人”的因素。因此，华文小学、独立中学的华文，要达到如台湾、中国一样的母语水准。但在全球化的年代，英文的水准不理想，就失去市场竞争的条件，而马来语没达到适当的程度，在所居地就会被边缘化。三语的负担，对学生是相当沉重的。如果不顾及学习者的能力，在多语环境里的民族语言学校，可能出现如下的情况：

《星洲日报》2007年4月1日报道，大马教育部长拿督韩春锦3月31日指出，马华将为大马全国华小升上初一或预备班的学生，提供1年全免的马来文及英文补习，以加强学生的语文基础，进而减少华裔学生的辍学率。

马来西亚的华人子弟，90%进入华文小学，小学生毕业后，约90%的华小学生升上国民型中学。据说在国民型中学里的华裔学生，辍学率可能提升到30%，因为国民型中学以马来语为教学媒介语。华文小学却以华文为教学媒介语，升上国民型中学以后，学生没办法克服教学媒介语转变的困难而辍学，人数逐年增加。

8)周清海《全球化环境下的华语文与华语文教学》，见《全球化环境下的华语文与华语文教学》（新加坡青年书局，2007）页75-88

以中国或台湾那样的母语水准的华文程度来要求在马来西亚成长、而又要在那里生活的学生，是不是可能的？如何让华文的学习不影响当地行政语言的学习，以及英语的学习，是应该好好考虑的。我们不能只培养华文程度高而不能在所在地竞争或国际上竞争的下一代。为了保持母语水准而让年轻的一代被边缘化，恐怕是不适当的。

“忽略语言的工具性，无视社会发展的交际需要，就会转向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无视语言在民族团结和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就会加速母语的消亡。”⁹⁾我们既不希望成为“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又想保留自己的语言文化，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民族语言的学习，应该从国家利益、学习者的能力来通盘考虑。

华文与当地国家的语文政策和教育政策的协调与融合问题，在东南亚一直是个难以解决的难题。董蓓菲对东南亚华文教学的问题，做了下列相当中肯的评论：

东南亚诸国为华文地位而抗争的历史由来已久，故华文教育定位是关系到东南亚华校和华文教育生存、发展的核心问题。……华文教育纳入国家教育体系或游离在外，是个两难选择，但是东南亚华文教育工作者必须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华文教育与所在国教育体制接轨是不争的事实，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¹⁰⁾

当然在中国发展的影响下，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也出现了一些好势头的：

(吉隆坡讯) 据《南洋商报》调查显示，由于中国崛起，使到中文使用价值大大提高后，已吸引家长纷纷把孩子送入华文独立中学求学，全国60所独中今年新生激增，初步估计近5000人。

除了“中国风”之外，严谨校风及注重中华文化遗产，也是吸引家长把孩子送入独中的原因。董总消息透露，独中学生人数最高峰期是在1994年，全国独中学生约5万8000人，过后不断下降。2007年开始回升，突破5万5000人。(2008年1月11日，联合早报)

9) 郭熙主编《华语教学概论》(商务印书馆, 2007年) 页1

10) 董蓓菲《东南亚华文教育的回顾与前瞻》，未刊稿。

马来西亚华人约占25.4%，如果当地政府承认华文为官方语文之一，就可能解决这两难的问题。华文能否转变为官方语文之一，只有通过政治的办法解决。但从全球的华文发展趋势来看，如果有一天，汉语像英语一样，成为国际语言，在东南亚，汉语的学习也就有可能不再与民族情节紧密相连，就像今天学习英语一样。只有在华文成为国际语文时，华文的两难问题，才能最终解决。但我们始终不能忘记，语言的“地”的问题，落地生根应该作为考量语言程度的首要依据。¹¹⁾

从语言选择的角度看，台湾和香港可以当作两个特殊的例子。

香港强调“两文三语”，而且尽力、逐步地推展普通话，可是教中文，却仍旧倾向于用广东话。广东话成为香港人的身份特征。普通话和广东话在香港教育里应扮演怎样的角色，关心香港语言问题的朋友有不同的意见：

1、要是普通话能够成为教学语言。那是最理想的推广方法。但是，在当前香港的情况来说，

是缺乏以普通话授课的各科师资的。唯一可行的过渡方法，是用普通话教授中文课。

(欧阳

汝颖)

2、也许可以考虑让有些人学习粤语与英语，而让另一些人选择学习粤语与普通话。只要香港人在学校继续使用粤语，而且在学校里也能推广普通话，鼓励大家多学习普通话，粤语就能保持，而普通话也能更普及。……台湾都市中的青少年已经逐渐失去说台湾话的能力，这就是学校中没有使用台湾话造成的。(李英哲)

3、主张采用普通话作为语文科的教学语言，不能说不对，只是里头既有师资的要求，又有

11)参考周清海《亚太地区华语文华语语文教育》见《亚洲太平洋地区华语文教育与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页1-1

师生之间和学生之间之传意问题，如果师资不足，传意又有窒碍，就有实行的困难，在语文技能训练和语文知识吸收方面，也不会收到预期的教学效果。

小学生的语言经验并不丰富，比成人更不容易听懂普通话。…故此普通话进入学校课程，宜经过独立讲授的阶段，不宜立刻成为中文科的教学语言。（李学铭）

4、没有普通话科，普通话只作为中文科的教学媒介来传授，恐怕不能把普通话教成功。…

（王培光）

5、长远而言（2010年以后），香港的中国语文科会用普通话教授，普通话科和中国语文合并会是一个过渡的做法。至于学校其他非语文学科，可能仍然沿用母语（即粤语）。相信香港学校采用普通话作为各科教学媒介语的现象不会在20年内出现。主要原因是估计粤语势力在香港社会仍会维持一段颇长的时间。（何国祥）

这些都是在推行层面上的意见，但没有一个人反对推行普通话。至于在普通话的推广方面，我曾提出下面的意见：

香港在推广普通话时，没有说普通话大环境的支持，更需要注意制造普通话的大环境，

而不是提高普通话的水准。也就是说，在香港、普及普通话比提高普通话的水准更重要。

二、在教学上，必须建立说普通话的信心，因此说普通话的流利度比准确度更重要。过度强调准确度，对建立说普通话的信心没有任何帮助。

主要方言和英语对香港口语和书面语的影响，是难以避免的，但在大众传播和教育方面，

注意建立标准，是可行的。大众传播和教育所树立的标准，将直接影响香港的书面语和说的普通话。

并且说了下面的话：

新加坡的华语能力，需要相当的时间才有办法提升；台湾的国语，人为地增加了太多的地方色彩；而台湾和中国一样，都缺乏说英语的大环境。只有香港，具有高度的华语书面语能力，又具有说英语的大环境，在新的语言压力下，将来肯定会有不可忽视的发展。香港具有双语的环境，如果有了说普通话的大环境的支持，将来华人社区真正的双语精英，可能出现在香港，而不是新加坡、台湾或者中国。¹²⁾

但是，从2002到现在，六年来的发展看，在香港的日常生活里，普通话虽然稍微普及了，但立法机构仍然用广东话，用普通话教中文，进展仍然缓慢，香港社会和中国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和英美的关系将会越来越疏远，香港的双语优势，逐渐在消失中，是不是真能出现华人社会的 bilingual 精英，仍有待观察。

广东话在香港有广大的社会基础，是不会在香港消失的。香港所面对的问题仍旧是中英双语的学习问题。怎样利用广东话的基础来支撑现代汉语的学习，怎样平衡广东话、普通话和英语，是香港语文教育者所面对的难题。¹³⁾

台湾的标准国语虽然并不完全等于大陆的标准普通话，但和标准普通话是非常接近的，也和其他华语区的华语保有相同的核心。至于日常生活中通行的，受闽南语影响的“台湾国语”，只是语言的地方变体，相当于标准普通话的地方变体，如福建普通话，上海普通话，等等。王理嘉下面的论述是很精彩的：

除非台湾国语也用于正规的书面语及电视广播上，否则随着台湾民众教育文化程度愈来愈

12)周清海多语环境里语言规划所思考的重点与面对的问题——兼谈香港可以借鉴些什》普通话教育的发展和推广国际研讨会（2002年5月16至18日）主讲论文，香港大学教育学院普通话培训测试中心主办。

13)关于香港的语文教育问题，可参考周清海《语言与语言教学论文集》（新加坡泛太平洋出版社，2004年）以及《全球化环境下的华语文与华语文教学》（新加坡青年书局，2007）里的有关论文

高，台湾国语中移植自闽南方言的成分将有很大一部分自行消失，而逐步向标准国语靠拢，

或是成为台湾国语的次方言保留下来。¹⁴⁾

关于台湾国语的前景，我认为它仍不太定型，是一种具有明显的过渡性质的标准国语的变体。即使是民进党执政的8年，尽全力的推行台湾国语，台湾国语的文化、社会地位仍旧不如标准国语。如果为了制造台湾人的认同特点，而人为的、刻意地扩大“台湾国语”的用途，将“台湾国语”用于广播传媒上，只有台湾的闽南人、懂闽南语的外省人，以及少数有闽南语背景的华人听得懂，这种将使台湾的传播表达，限制在少数的人群里，对台湾和国际接轨，不一定是好事。具有闽南话特点台湾国语，随着台湾人教育程度的提升，也会在国际交流中逐渐向标准国语靠拢的。

相同的，我认为香港的特殊书面语——港式书面语，也会在和大陆以及其他华语区的交流中，逐渐向汉语标准语靠拢。在普及普通话之后，香港普通话的地方变体特质，尤其是书面语的变体，将会逐步减少。

语言的学习，进入到书面语，就是标准语的学习，而高度统一的标准语，就是华语的传统。在标准语的学习、外语的学习，以及方言的保存上，我们更注意前两者。香港以粤语教学标准书面语，对书面语的学习，有利还是有弊？学生的书面语学习负担，是不是加重了？这些都值得我们进一步观察。

总之，从汉语国际化的角度和所居地的特殊需要来观察，语文的选择与教育问题，必须注意下列几点：

一、语言劣势是应该避免的。脱离现实的语言教育，只会制造语言劣势，让自己和自己的下一代被边缘化。

华语文的推广与发展，必须在“大华语”的概念下进行，在交流中趋同。
各华语区应该尽量向普通话靠拢，避免提倡地区性语言。在数码资讯时代，这样做，

14)王理嘉 《汉语拼音运动与汉民族标准语》（语文出版社，2003）
13

有助于讯息交流，华人共同语的建立，更有助于华语的国际推广。

亚太区都是双语或多语的社会，这要求语文的学习，不可能是“文学语言”的学习。在推广、普及与应用的要求下，语言的“大众化”是必然出现的现象。所以，应该重视华语文的“口语化”、“大众化”，而不是“文言化”、“地方化”或者“方言化”。

只有在华语文成为国际语文时，华文的学习才能像英语一样，不带民族情感，语言的“人”和“地”的问题才有望解决。¹⁵⁾

15)参考周清海《亚太地区华语文华语语文教育》见《亚洲太平洋地区华语文教育与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页1-1

参考书目：

- 1、陈章太、戴昭铭等《世纪之交的中国应用语言学研究》（华语教学出版社，2000年）
 - 2、郭熙主编《华语教学概论》（商务印书馆，2007）
 - 3、何国祥《香港普通话科教学——理论与实践》（香港三联书店，2005）
 - 4、刘进才《语言运动与中国现代文学》（中华书局，2007）
 - 5、王理嘉《汉语拼音运动与汉民族标准语》（语文出版社，2003）
 - 6、新加坡华文研究会《新加坡华文教学论文五集》（教育出版社，2008）
 - 7、云惟利《一种方言在两地三代间的变异：文昌话和漳州话在本土与海外的时地差异》（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
 - 8、“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课题组编《2006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商务印书馆，2007）
- T